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论

长征：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 蒋建农

● 长征，是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伟大历程。参加长征的有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总人数高达20万（沿途扩红人数不计），总里程约6.5万里，途经大半个中国。这次胜利的远征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赢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长征的三大历史背景和三大历史任务

长征有三大历史背景：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危机，二是因日本侵略造成中华民族的危机，不太被关注的第三个重要历史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中心发生转移。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南方是传统的革命中心，不仅爆发过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两次护法战争，也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策源地。然而，蒋介石集团背叛国民革命、建立南京国民党政权后，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的政治代表，获得江浙财阀等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其执政受到世界列强的普遍承认，特别是得到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经济、军事力量迅速膨胀，在新旧军阀混战中逐步胜出，于1928年12月在形式上完

成对全国的统一。北方的反动封建统治势力自辛亥革命以来，迭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打击，又在北伐战争和与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彻底落败，渐成土崩瓦解之势。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由此引发东北抗日义勇军、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革命中心北移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

随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势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广州、武汉等白区中心城市难以立足。大革命失败之初，趁蒋介石政权立足未稳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

间隙建立的各南方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陆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成为游击区。这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由南向北不断渗透、拓展。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场所迁移到西北去。”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适时北移，是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的必要前提条件。

长征的三大历史背景赋予其三大历史任务，即挽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危局，开辟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实现中国革命战略重心（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的北移。这三大历史任务归结在长征这一历史过程之中，由此展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路红军创造的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

夺取长征胜利的五大关键因素

其一，党的坚强领导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途中，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不仅是国民党军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步深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恶劣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险阻，还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等的严重干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丢失根据地和被迫长征如同一场惊涛骇浪骤然降临，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使团结一致成为全党全军的共同自觉，如此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坚强的党性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在遵义会议上通过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熟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红军抵达陕北后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保障。

其二，官兵一致、上下一心是长征胜利的重要法宝。与历次反“围剿”分散开展的作战不同，长征自始至终是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下全国各路红军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全体红军将士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在长征时期极端险峻危急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彰显。红军上下普遍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和团结的弥足珍贵，团结奋斗成为红军全体将士的共识。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密切协作，战略上相互策应、战役上紧密配合、会师时顺利合组改编，实行官兵一致和民主平等的原则，无不激励和温暖着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汇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构成最终夺取长征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三，“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红军各部队长征共途经14个省份、2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包括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较少甚至完全没有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历代

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挑拨，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红军产生畏惧甚至敌视心理，党的群众基础薄弱。同时，红军指战员们离开生活和战斗多年的根据地，与朝夕相处的亲人分离，痛感缺少人民的支持和没有根据地依托的失落与困难；越往北走，语言、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等差异越大，要融入当地民众之中困难重重；长征途中一直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经常在险恶的环境下行军和作战，连正常的休息时间都难以保证，遑论开展群众工作。然而，千难万苦不能割裂党和红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红军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走到哪里，革命思想、革命主张就宣传到哪里；每到一地都镇压当地反动势力，取消苛捐杂税，严格公买公卖，保护工商业；在有条件的地方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群众组织与武装部队；等等。红军以严明的军纪、模范的爱民言行和发自内心的热忱，迅速赢得沿途各族群众的好感和认同。毛泽东对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作了精辟概括：“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其四，北上抗日是夺取长征胜利的旗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党和红军把拯救民族危亡和解除中国革命危机统一于北上抗日的行动中，鲜明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长征是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承担光荣职责的伟大实践，红军的行动因此赢得了长征沿途一切不甘做亡国奴的各族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同时也减轻了地方实力派和沿途诸多政治军事集团的敌视。人们发现，中国有这样一个群体，虽然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处于生死未卜的危险境地，却依然肩负着民族解放的期望，胸怀世界大同的理想。他们凭借着崇高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以处于劣势的装备和兵力英勇奋战，冲破几十倍于己的强敌的围追堵截，克服

超越生存极限的各种艰难险阻，掀起以拯救民族危亡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新高潮。长征胜利这一人间奇迹，使得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四万万同胞看到了民族解放和兴盛的希望，也使得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坚强。

其五，寻找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是长征胜利的重要标志。长征是从丧失革命根据地开始的，又以能否找到或建立新的根据地（落脚点）作为其胜利与否的重要标志，这也是党和红军能否真正转危为安的关键。寻找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首先，是为了生存和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是支撑红军成为“绝顶天兵”的直接动力；其次，沿途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供给点和“加油站”，让长途跋涉和持续作战的红军战士得以休整；最后，探寻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新发展方向的探索。踏上长征路的红军，要寻找和开辟新的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既是既定的；在陕甘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是红军由南向北一路转战中用血的代价摸索出的结论；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历史趋势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使命，决定了红军要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薄弱和邻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的大本营。长征途中各路红军重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看似是行军路线和确定目的地的问题，实际上与长征的历史背景有关，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关，与中国南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力量的变化有关，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其实质是对中国革命任务、路线和前途的规律性认识问题，是关于长征道路的问题。于是，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各路红军的长征在这里落脚，八路军从这里奔赴抗日战场，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开启了中国革命领导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篇章。

其四，长征中各路红军北上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行动，不仅极大鼓舞了全体红军将士的斗志，成为引导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旗帜，而且促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从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使中国革命由低谷重新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恰如毛泽东所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作者系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其一，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浴火重生，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其二，长征顺应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中心由南向北转移的历史趋势，完成党和红军主要力量的北移。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

族战争的出发点，中国的历史进程从此展开新的篇章。

其三，长征中各路红军北上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行动，不仅极大鼓舞了全体红军将士的斗志，成为引导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旗帜，而且促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从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使中国革命由低谷重新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恰如毛泽东所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作者系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筑牢国家文化安全防线

□ 刘宇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中深层次的、基础性的部分，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精神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传播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更好地实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目的。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江西作为红土圣地，要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大力传承红色基因，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当前文化安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在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红色基因传承也遭遇着隐形的风险和机遇。

一是算法推荐下的“信息茧房”。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在流量逻辑和资本逐利的驱使下，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蔓延，部分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构建起“信息茧房”，使得一些缺乏鉴别力的青少年沉迷于低俗庸俗内容，红色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被消解的风险。

二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相比于过去的公然诋毁抹黑，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更加隐蔽。有的打着“揭秘”“还原历史”的幌子，用所谓的“人性化”视角去歪曲、无限放大一些英雄人物的缺点；有的则肆意篡改、戏说红色经典，搞“低级红”“高级黑”；还有的在学术包装下，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进行“重新解读”。这些手法极具迷惑性，必须高度重视、坚决纠正。

三是红色基因资源的过度商业化。红色基因具有政治引领、价值塑造、精神激励等重要功能。然而，少数地方在开发利用红色资源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重商业开发、轻精神内涵，导致红色基因资源被过度商业化，消解了红色文化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对国家文化安全也存在潜在威胁。

红色基因是防范文化安全风险的精神抗体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核心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重点是防范和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红色基因不仅是历史的积淀，也是我们应对现实挑战、防范风险的“精神抗体”。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铸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积累的先进文化，蕴含着指引党和人民增强信仰、信念、信心，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江西的红色历史，是一部广大军民对党忠诚的壮丽史诗，积淀了底蕴深厚的红色文化，淬炼出深深融入赣鄱儿女血脉的红色基因。面对当下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尤其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唯有从红色基因中汲取信仰力量，才能在众声喧哗中保持清醒，在复杂现实中把准方向。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否认历史客观规律性的错误思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江西拥有保存完好、品类丰富、数量众多的

革命旧址群和革命文物资源，这些是不可辩驳的历史铁证，有利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百余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把红色基因研究好、阐释好，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正本清源、激浊扬清，让历史虚无主义无处遁形。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既要抵御外部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又要防范内部的精神迷失与价值观念偏差等风险挑战。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基因的红土地，承载着中国革命的苦难与辉煌，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孕育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有利于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畸形价值观念，赓续红色基因，能让广大干部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夯实精神根基，从而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守正创新用好红色资源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加强红色基因保护和利用。实施红色基因传承数字化工程，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对全省革命文物进行高精度的数字化采集与全景式展示，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红色题材出版物、影视剧、文创产品的审查把关。建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负面清单制度，坚决抵制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过度商业化、泛娱乐化现象。

充分发挥红色基因的育人功能。突出地方红色文化优势和特色，利用革命旧址遗址、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等开展红色研学访学，打造“行走的思政课”，讲好红色故事、加强红色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让红色成为立德树人的鲜活底色。发挥好党校（行政学院）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作用，把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纳入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不断提高其防范化解文化安全风险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加强红色文化传播与推广。主动适应全媒体时代传播规律，创新红色故事的传播话语体系，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以小故事讲述大道理，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群众心里。针对网络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谬论，要敢于亮剑、善于发声，坚决驳斥错误言论。大力推动红色文化“走出去”，加强对外宣介力度，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助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